

# 篇首语

## 行动者与研究者应共同推动传播创新

王辰瑶\*

进入 21 世纪，数字化革命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多重变量彻底改变了 20 世纪的大众传播环境和业态。谈论“创新”在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如此常见，甚至有沦为陈词滥调之嫌。传播主体、渠道、内容、形式和对象——当所有方面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变化时，行动者难免陷入焦虑与盲从。新技术、新媒体、新观念、新产品、新风格，哪些代表未来的趋势？哪些注定是眼前的泡沫？行动者如同过河卒子，只能勇敢向前，虽然心怀希望却也时常惴惴。这正是当下传播领域的日常图景——不断尝试、不断失败、不断成长。如同诗人弗罗斯特所说，最好的出路总在穿越困境。迎难而上的人，姿态或许不够优雅，风度或许不能雍容，穿越困境的过程或许也没有太多英雄主义，但比这些重要的是继续走下去的韧性。

媒体融合战略已经走过第十年，行动者仍在探索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道路上跋涉。我所在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去过几十家各种类型的媒体组织实地调查，也做了近百名媒体人的深度访谈，看到实践场景下行动者的经历是如此鲜活生动，有时作为研究者的我难免会感到不安。表层的不安是：核心理论创新的速度跟不上实践发展的速度。20 世纪，基于大众传播语境的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当下的传播现实，更遑论预测未来的走向。当然，这绝不是说要把 20 世纪的传播理论扫入故纸堆。前辈如何感知并分析当时新生的传播力量、如何将传播问题与社会深层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如何在传播经验的细腻考

---

\*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全球公益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创新与新闻叙述。

察中体现对时代的大关切？这些仍是今日之研究者需要学习与继承的。如果说传播实践中的创新是时不我待，而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使其在面对全新经验时，需要更多时间来酝酿理论的创新突破，那么更让我感到深层不安的是：传播学术研究似乎正在“累积”远离实践的风险。我所在的研究团队做的另一个项目是对全球新闻传播创新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性分析，并发表年度学术报告。因为每年都要抽出专门的时间集中阅读和分析最新文献，这项工作意外地给我们带来一些“祛魅”的认知。我们意识到有不少研究虽看上去很“新”，但理论建构在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和假想中，而不是建立在坚实的行动大地上。这就导致一些研究既不真正关心实践中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也不试图理解行动者的逻辑。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传播领域的行动者和研究者很可能会越来越“无话可说”。

研究者其实很少能直接给行动者“出谋划策”。每当我们有机会走进媒体组织，不管面对多小的团队，总要先说一句“我们是来学习的”。这绝非客套，而是真的知道自己并不能解决行动者的日常困惑，如流量的问题、考核的问题、内部协同的问题等。实际上，行动者对这些问题通常都有应对方法，哪怕他们看出背后存在一时难以解决的症结，也都或多或少有应对的“权宜之计”。研究者所要做的首先是虚心学习，充分理解这些经验以及经验背后的逻辑。在实地研究中，我们多次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起初，受访者抱着挺高的期待接待我们，但很快，他们就开始礼貌地掩饰对我们的“失望”。但经验告诉我们，撑过这一小段“尴尬”后，就会进入真正的深入交流。因为真的行动者总有超越其个人利益的关切，当他们发现这些被繁重的日常工作重重包裹住的价值关切竟能与看似毫无现实助益的研究者痛快地聊出来的时候，他们都会变得相当健谈并经常一再延长约定好的访谈时间。

我总觉得，正是在研究中经历的这些感性时刻，才让我越发坚信行动者和研究者迫切需要，也完全可以共同推动传播创新的理念。我们越多接触传播实践中的行动者，就越觉得研究者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者不是从行动者那里“偷窥”内幕，然后安上刻板的概念，再输出为一篇行动者看不懂、不需要甚至被误解和扭曲的论文。研究者也不是行动者的“写手”或“军师”，把经验材料贴上一些学术标签，包装成所谓的项目或报告。行动者与研究者的合作，本质上不是利益交换，而是建立共识，包括价值、制度和方法等不同层面的共识。研究者与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不是从抽象和宏观的问题

开始的，而是从行动者的日常经验出发的。越是微观、越是复杂和生动的经验事实，越能把研究者和行动者紧密地联系起来。

近年来，“实践转向”“行动主义立场”已成为研究界的口号，但不能说重视实践、关注实践、记录实践就算完成了研究的“实践转向”。要想做到行动与研究的结合，一定得通过平等的“双向奔赴”关系的建构。这种关系的建构有时甚至会火花四溅，如当行动者试图纠正在他们看来是研究者的“偏见”时，或是研究者试图用其他“反例”挑战行动者的经验时。这是充满活力的碰撞，较之庸俗的互捧和冷漠的互厌，实在是有意思多了。传播创新需要这样的健康关系。